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报告(第19期)



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走向

复旦大学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协同创新中心

2017年2月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报告

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走向

第 19 期

2017 年 2 月

作者简介

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上海美国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曙光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华盛顿季刊》编委，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理事，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会员。

主要从事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美关系及亚太地区政治与安全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出版专著《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世事如棋局局新—21 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格局》，英文研究报告《中美之间：处理危机与保持和平》，合著《转型中的亚太地区秩序》，译著《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

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还积极参加政府决策咨询，承担外交部委托研究课题，应邀参加外交部专家会议，率领外交部专家学者小组出国调研。

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走向

【内容提要】随着特朗普的执政，美国内外政策的变化有可能给中美关系的环境、议程和互动方式带来新的变化，双边关系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但是中美关系不可能另起炉灶，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演进，既有的架构和特征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一关系的未来走向。与过去相比，今天我在处理对美关系方面拥有更多的资源、更加丰富的经验和更强的战略运筹能力。我们应该争取使“相互调适型”成为两国间互动的基本模式，以经贸关系为抓手，发展务实的合作伙伴关系。在此过程中，要谋求提高中美关系的品质，使双边关系的发展更好地体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上世纪90年代，中美两国探索确立后冷战时代双边关系的新框架，中国面对的是如何在“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中与美国打交道，而美国面对的则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到了21世纪初，中美关系的发展形成了新的棋局：美国在强化对华战略防范的同时，在经济和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借重

中国的作用，中国则通过扩大与美国的合作稳步推进在经济和台湾等问题上的利益目标。中美交往的机制化水平、相互依存的对称性和总体关系的稳定性显著提高。2008年以后，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中美力量对比变化的步伐加快，各自战略调整的态势更加显著，两国关系中竞争的因素上升。随着特朗普的执政，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下一个阶段，美国内外政策的变化有可能给中美关系的环境、议程和互动方式带来新的变化，双边关系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一、中美关系的新现实

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既延续了前一阶段的特点，又鲜明地表现出新的特征，这8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构成了下阶段两国关系的新起点。

首先是经贸关系的变化。贸易方面，2009年，美国对华出口（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额为877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5.54%；2015年，美国对华出口总额为1651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3%。中国已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作为美国主要出口市场之一的重要性在稳步上升。¹ 2015年，中国跃升为美国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投资方面，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超过了美国对华直接投资。2016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更达到456亿美元，是2015年的3

倍。在美国的 50 个州中，47 个州都有来自中国的投资。²此外，中国是美国国债的第二大外国持有者（2016 年 10 月，日本超过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国债持有者）。2016 年 12 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为 1.06 万亿美元。以上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重要性在上升，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对称性在提高。

其次是中美在西太平洋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从军事投入看，2000 年中国的国防支出为 230 亿美元，美国为 3020 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 7.6%，到 2015 年，中国的国防支出已升至美国的 36%。³ 经过十余年的军事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军事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与美国的总体差距缩小。而在西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第一岛链之内，中美军事力量对比正在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⁴

第三是中国积极进取的态势更加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为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取向之一就是积极谋求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接受美国主持制定的国际规则，因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设定的棋局中的一个“玩家”。近年来，随着力量和自信心的增长，中国外交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上升，开始提出和推动新的国际合作构想。金砖国家组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政治经济合作平台的发展，表明中国

越来越具有主动设局的能力，这会不断拓展中国对美博弈的空间、增加中国对美博弈的资源。

第四是中美互动态势的变化。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美国掌握了中美关系的主动权，主导着中美关系的话语权、议程设置和互动过程，中国在双边互动中处于被动地位。近年来，中国在对美互动中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主动性。在中美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的背景下，中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以规避大国政治的悲剧和“修昔底德陷阱”，显示了中方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建设性态度。自 2013 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每年都有一次深度对话，从加州庄园会晤到北京瀛台夜话，从华盛顿白宫秋叙到杭州西湖品茶，习主席向对方解释中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阐述对中美关系的愿景，分享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坚定地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使对方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内外政策，推动奥巴马政府积极扩大对华合作、建设性地管控分歧。此外，中国通过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拓展、运筹大国关系和经营周边关系，既调动美国，也牵制美国，有效提升我对美博弈的主动态势。

随着特朗普的执政，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会呈现出新的特征，但双边关系不可能另起炉灶，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演进，既有的架构和特征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一关

系的未来走向。具体而言，这一影响主要体现以下方面。

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增强。由于中国在经济和其他领域对美国的重要性上升，美国决策者不得不更加重视对华关系，不得不更加慎重地处理对华关系。在面对摩擦和分歧时，不会轻易采取使中美关系出现重大波动、遭受严重挫折的行动。另一方面，中美之间业已形成的广泛的对话和交流机制（包括元首会晤）已成为经营和管理这一关系的重要手段，它有助于增进沟通和相互理解，加强对话与磋商，及时排除险情，释放压力。

中美关系的正能量增加。中国领导人向来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强调要从战略高度和以长远眼光看待中美关系，要积极地推进合作、建设性地管控分歧，要使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面，等等。而美方则由于政治周期的影响（总统选举、国会中期选举等），常常以短期的利益诉求和战术性的行为处理对华关系，导致双边关系的波动。因此，从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看，中国比美国提供了更多的正能量。随着中国在中美互动中地位的提升，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增强，能够提供的正能量增加。不仅如此，与美国两党政治下内外政策多变相比，中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性远高于美国，这使得中国能够一以贯之地塑造积极和建设性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成熟度上升。近年来，作为中美关系新常态

的表现，中美两国之间的摩擦加剧，合作加强，⁵有时表现得很激烈的摩擦和分歧并没有妨碍双方在各个层面的合作。不仅如此，经过双方的努力，对一些摩擦和分歧的处理还导致了新的合作机会。⁶这表明双方能够以更加成熟的心态处理两国关系。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要“以宽广的胸怀对待差异和分歧”。⁷这种达观的心态表明中美关系变得更加成熟，有助于提升两国关系的韧性。

自从尼克松访华以来，中美关系一方面由于国际环境和中美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同时也是更重要的）则表现出持续成长的总体趋势：双方利益交融的水平不断深化，交往的频率稳步提高，合作面持续拓展，互动的机制化程度显著增强，管理双边关系的能力大幅提升。在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正是这一趋势确保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延续。这一规律也同样适用于特朗普执政时期的中美关系。

二、特朗普对华政策走向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因素：特朗普及其团队的执政理念；总体政策倾向；对华政策偏好。特朗普的个人理念具有如下特征。⁸首先，他是“美国优先”的坚定主张者。与二战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相比，特朗普的

世界领导欲不强，他反对美国过多参与世界事务、在海外背上太多包袱，认为美国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把自己的事办好才是正道。其次，他是经济民族主义者，关心的是美国本国的经济利益和福祉，不满意全球化给美国的经济和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明显的保护主义倾向。再次，他的国际观是以传统的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缺乏全球视野和全球意识，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持怀疑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孤立主义的色彩。最后，特朗普是传统生产力的代表，而非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作为房地产商，他重视的是传统的支柱产业，如制造业、建筑业、钢铁、石油等，他在竞选过程中几乎没有谈到过将如何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特朗普提名的主要助手和内阁成员，以大商人和具有强势风格的军人为主，这表明其政府的执政风格是重视经济，注重执行力。共和党内传统上有两派，一是商业派，重视经济利益，二是安全派，重视国家安全。特朗普的执政团队无疑是二者的结合，但其个人的商业背景和重商倾向将使商业派比安全派拥有更大的政策影响力。他设立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来推动重振制造业、减少贸易逆差、防止就业岗位流向海外，更体现了他对传统制造业和贸易的高度重视。

综合各种因素分析，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有可能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在关注重点上，重视经济，淡化意识形态和地

缘政治因素。其次，在政策目标上，重在“谋利”而非“谋势”，对中国的崛起，更多关注其对美国具体的利益影响（如经贸利益、军事力量优势等），而较少从中国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和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的影响角度考虑。第三，在互动形式上，重视双边，淡化多边，因为特朗普的世界观是传统的国家观而非国际观或全球观，不太注重与中国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互动。

具体而言，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将围绕在以下问题领域与中国的互动展开：经贸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朝核问题，其他国际和全球问题。

经贸问题无疑是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优先关注。鉴于特朗普重视重振美国的制造业以为美国的蓝领工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他重点锁定中国和墨西哥“偷走”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和对美大量出口制造业产品的问题。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关于对华问题的评论主要集中在贸易领域，他威胁要限制中国对美出口，抨击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在共和党大会上通过的党纲则批评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在政府采购中拒绝美国制造，对向美出口企业提供补贴，侵犯知识产权等。⁹ 特朗普提名的贸易“三驾马车”——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毫无疑问，中美经贸摩擦会加剧，具体表现为美国对华采取更多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向我施压。虽然特朗普不太可能像在竞选期间威胁的那样要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45% 的关税，也不可能与中国开展全面的贸易战，但却很可能锁定一些类别的产品，如钢铁、铝、计算机及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加征关税，其最终目的是一是减少中国对美出口，二是扩大美国对华出口。鉴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美日贸易摩擦的经验，美方很可能希望与中方达成某种双边谅解，让中方自愿限制某些商品的对美出口，扩大从美国的进口，为此目的，特朗普政府将反复与中国激烈博弈。

另一方面，特朗普有可能会欢迎中国扩大对美投资，特别是对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这有助于重振制造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并改善美国的基础设施状况。鉴于奥巴马任内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特朗普有可能愿意接手完成这一谈判，通过与中方达成协议来鼓励中国对美投资，并推动中方扩大美国在华投资的准入范围。

在台湾问题上，鉴于共和党一贯的亲台倾向，以及特朗普的顾问和助手中不乏亲台分子，特朗普执政后美台关系的发展值得关注。特朗普当选后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电

话交谈，以及他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轻率评论，令人们担心他有意在美国对台政策上打破现状。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特朗普要实质性地改变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那将导致中美关系的重大动荡，他将无法达到其在华关系上的经济目标。因此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特朗普主要是把台湾问题作为对华博弈的工具，以此迫使中国在其关心的问题上（主要是经贸问题）让步，但不会突破美国对台政策的现有框架。正如他在2月10日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时所表示的，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¹⁰在现有框架内，特朗普政府或者为了向中方施压（从中国大陆得到好处），或者为了加大对台支持力度（从台湾得到更多好处），或者两者兼有，有可能采取如下措施：提高美国对台军售的质量；提升美台官方交往层级，扩大美台官方交往范围；在台湾拓展“国际空间”问题上大力挺台等。

在南海问题上，特朗普团队发表了一些强硬言论，如禁止中国在南海建岛和进入南海人造岛礁等，但这些言论听上去更像是一种强硬立场的宣示而非深思熟虑的政策阐述。¹¹2月初美国防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访问日本期间就南海问题表示，将支持外交努力，目前没有必要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¹²这个表态更接近于严肃的政策表述。如果从大的背景看，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应该是不同于奥巴马

政府的。奥巴马政府提出和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并将南海问题作为实施该战略的重要抓手；特朗普政府总体上是内向型，优先考虑国内问题，在亚太地区致力于保持美国的军事力量优势，但不是要扩大对外军事干预，因此南海问题在其地区政策议程上的地位并不突出。不仅如此，随着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南海争端当事国转向与中国改善关系，谋求通过双边或多边努力管控分歧，南海争端正局部降温，这使得美国缺乏加大介入南海问题的借口。但是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在美国军方（特别是美军太平洋总部）的推动下，特朗普国安团队开放绿灯，让美军在南海采取更加挑衅性的行动（这些行动方案曾被奥巴马政府阻止），如美国军舰更加频繁地进入中国控制的南沙岛礁的 12 海里范围内，更加靠近这些岛礁，甚至进入西沙群岛岛礁的 12 海里范围内，以及与日本等盟友在南海开展联合巡航等。这些战术上的挑衅动作无疑将加剧中美在南海的对抗，升高南海的紧张局势。¹³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朝政策的走向。鉴于朝鲜正在积极推进其核武器和导弹项目¹⁴，以获得对美国本土目标进行核打击的可靠能力，对美国来说就面临着是否容忍朝鲜跨越这一门槛的问题，而特朗普任期内很可能就要面对这一挑战，因此朝核问题在特朗普的亚太政策议程上占有突出位置。华

盛顿除了加强与韩国、日本的政策协调以及与朝鲜进行双边接触外，也会寄希望于中国的配合。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表示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作为不够，因此他很可能要通过经济、外交、安全等手段迫使中国加大对朝压力，如切断对朝粮食和能源供应等。但是中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可能应美国的要求把朝鲜“往死里整，”这样随着朝核问题的突出，中美在处理该问题上的分歧就会扩大，朝核问题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外溢效应会增大。另一方面，美国以应对朝鲜核威胁为名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挑战中国的安全利益，也不利于中美在半岛的积极互动。更险恶的是，鉴于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和共和党在安全问题上的强硬倾向，特朗普政府在阻止朝鲜拥有打击美国本土的核能力的外交努力失败后，有可能对朝鲜的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而朝鲜也势必要进行还击，这样朝鲜半岛将陷入战火之中，并殃及整个东北亚。¹⁵在此情况下，中国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不可能置身事外，必将采取有效的方式应对，中美在朝鲜半岛的互动将超出外交范畴，这样中美关系将面临严峻考验。

在国际和全球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总体上将呈现收缩态势，这可能意味着中美互动面的缩小和互动性质的变化。中美将在反恐、朝鲜半岛、阿富汗等问题上保持磋商与合作，这对两国关系有正面意义，尽管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也会不

断考验中美关系。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像奥巴马政府那样通过积极插手中国周边事务来削弱中国的影响力，牵制中国的战略进取，它更可能采取离岸制衡的政策，重点在于加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力量优势而非直接介入来塑造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这样一来，中美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竞争的张力有望减轻，摩擦面缩小。鉴于特朗普的反全球化立场，美国不会积极谋求与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从应对气候变化到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中美合作的动能会减弱。这意味着近年来作为中美关系发展新增长点的全球治理合作会弱化。当然，鉴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美国是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全球治理是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全球治理的好坏也会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安全和福祉，因此特朗普的个人好恶不会导致美国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政策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鉴于中美两国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两国的合作仍是双边关系的一部分，只是其重要性和优先性将会下降。在奥巴马时期，中美在国际和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如伊核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对两国在其它问题领域（如南海问题）的矛盾和摩擦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在特朗普时期，该效应将会下降。

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展开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走向将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如执政团队的学习过程（包括团队

自身的变化)、国内政治经济局势的影响、外部环境尤其是中国外交的塑造效应等。在此过程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内形势变化以及重大国际事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事实上,中美建交之后,自里根政府以降的历任美国总统对华政策的演变轨迹和最终形态均与其执政之初的态势有较大甚至巨大的差距,因此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走向也可能再次验证这一规律。

三、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的机遇和挑战

特朗普的理念和政策偏好将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些重要变化。首先,与小布什和奥巴马时期越来越多地从国际层面审视中美关系不同,特朗普时期美方将首要地从国内的角度看待中美关系。这种从“国际格局中的中美关系”到“国内视阈中的中美关系”的转移,将导致中美互动环境和重心的变化,国内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将显著上升。其次,从中美关系的基础看,经济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是两大支柱,然而特朗普的内顾倾向将弱化国际合作这一支柱,从而使得经济在双边关系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但是另一方面,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又意味着中美经贸纠纷的增加,这将威胁经贸关系作为双边关系最重要的支柱的地位。如何处理双边经贸关系将成为特朗普执政时期中美互动的焦点。再次,

随着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战略，致力于以经济民族主义方式重振美国经济，中美将更加专注于各自的经济发展和实力的提升，两国在国家层面（而非国际层面）的竞争会更加突出。虽然中美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决定了两国必须继续推进经贸合作，但各自对合作收益（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仔细盘算和反复博弈将主导合作过程，合作的务实性和交易性特征更加明显。最后，由于特朗普的世界观和智力特征，他对中美关系持比较狭隘的视野，局限于一些具体的议题领域，很难对这一重要的双边关系形成较为宽广的思维架构。除非这一缺陷能够被其高级助手（国务卿或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作用弥补，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美高层对话的质量和中美互动的空间。

特朗普执政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从机遇看，鉴于特朗普本人没有向中国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模式、根据美国的偏好改造中国的强烈欲望，¹⁶中美在政治上的矛盾会减轻，这有利于中国国内政治稳定，也有利于增进中美战略互信。由于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像奥巴马政府那样热衷于通过积极插手中国周边事务来削弱中国的影响力，来自周边的外交与安全压力会相应减弱，这有利于中国更有成效地开展周边外交，稳定和发展周边关系，有利于中国更好地管控和处理海上争端。鉴于特朗普对发展美国经济的高度

重视，他或许在处理对华经贸关系上淡化政治和安全色彩，在放宽对华出口限制、改善中国在美投资环境方面有所作为，不排除中美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达成“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其他双边经贸协定的可能性。随着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地缘经济压力得到缓解，这有利于中国与东盟等国一道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谈判，也有利于中国推进其它形式的地区经济合作安排。鉴于特朗普政府对地缘政治博弈的兴趣较弱，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望较少受到来自美国的干扰和阻挠。最后，特朗普缺乏巩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的强烈愿望和积极推进全球治理的兴趣，这有利于正处在国家利益全球化和谋求扩大国际影响力阶段的中国更积极地在国际和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提升其国际地位，有利于中国更好地改革和塑造国际机制及规则，更好地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

从挑战看，首先是特朗普团队的对华态度和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特朗普团队总体上在对华问题上持强硬态度，而且这种强硬态度在不同层次上覆盖了经贸、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¹⁷ 不仅如此，特朗普执政团队新手较多，对情况不熟悉，又刚愎自用，喜欢不按常理出牌，从而颠覆“双方长期形成的、且十分习惯了的外交政治战略认识和打交道模式。”¹⁸ 对华强硬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变化会导致特朗普执政

初期双方对接的困难，妨碍在两国外交团队间形成有效的工作模式。其次是经贸领域。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实施将对中国经济和中美经贸关系产生广泛影响。特朗普对美国经济的刺激措施和美元加息将使美元更加强势，这将增大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快资本从中国外流；重振制造业将导致部分在华美资回流本土。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预期采取的强硬行动将加剧中美贸易摩擦，并有上升为贸易战的风险。在投资方面，特朗普也可能基于所谓的“互惠”原则要求中方扩大对美资开放，并以限制中国对美投资作为杠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包括“网络商业窃密”）也可能成为特朗普在经贸方面对华施压的另一个着力点。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信奉“以实力求和平”的原则，决心加大国防投入，提升美国军事力量，有可能导致美国对华军事优势进一步扩大，使中国在西太平洋面临来自美国更大的军事压力。同时鉴于其执政团队中鹰派军方人士较多，这些人有可能推动美军在南海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加剧中美在南海的对峙。如果中美之间（或中日之间）在东海、南海等地发生危机事件，美方有可能采取强硬和激进行为，从而升高冲突的风险。此外，预期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对朝鲜采取的强硬措施也会加剧中美之间的摩擦。最后，由于特朗普政府在西太平洋对中国采取离岸制衡的政策，它将鼓励日本发展军事力

量，加强对华牵制，而以安倍为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也会趁机加速提升日本的军事能力，强化在西太平洋制约中国的战略态势，这不仅意味着中日关系将总体上保持冷淡和僵持状态，更意味着中日之间在海上发生危机事件的较高风险。

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对接工作已陆续展开。2月10日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的通话交谈时间长，气氛热诚，标志着特朗普执政后中美高层交往正式启动。这次通话的重要性在于，特朗普确认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愿意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同意尽早实现会晤。¹⁹ 2月17日，王毅外长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波恩会晤，王毅期待双方“沿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方向，加强沟通，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深化合作，确保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总统任内取得更大发展”，蒂勒森表示，“美方期待与中方开展高层交往，增进相互理解，维持、完善和加强各领域对话合作机制，在经济、金融、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²⁰ 这标志着两国外交部门的对接。此外，美国新任财政部长努钦也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及财政部部长肖捷等人分别通了电话，表达了要加强与中方的交往、发展更加平衡的双边经济关系的愿望。²¹

尽管如此，双边关系具体如何展开还有待观察。从分析

的角度看，中美关系的演变大致上有三种模式。一是相互调适型，中美以谨慎和务实的方式开展互动，在互动过程中各有主动，相互适应、相互调整，推进合作，避免冲突，形成一种良性的工作模式。二是冲突型，双方秉持并坚持推进一系列相互抵触的政策目标，不愿意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调整（或相信能够迫使对方作出妥协和调整），两国关系冲突不断，在缺乏进行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意愿的情况下，双方的协调行为主要表现为发生冲突时的止损努力，这是一种消极的工作模式。三是主动-被动型。强势的一方主导双边关系的议程设置和交往方式，弱势的一方无意愿或无能力争取平等的互动态势，而是选择在互动过程中通过博弈来推进己方的利益目标，且强势的一方也能对弱势一方的利益予以适当照顾，因而两国关系能够避免大的冲突。这种工作模式下，双方有良好的沟通和稳定的互动预期，两国关系的可预见性强，但缺乏平等性。

从中美关系的历史看，上述三种互动模式在建交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均有所体现。在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应该争取使“相互调适型”成为两国间互动的基本模式。特朗普执政有很多新的特点，这对我管理中美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但是与过去相比，今天我在处理对美关系方面拥有更多的资源、更加丰富的经验和更强的战略运筹能

力。要处理好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对美关系，首先要积极研究、接触和影响对方，争取中美关系较快和较为平稳的过渡，但也要做好充分的斗争准备，因为中美之间“不打不相识”的情况也不少见。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尚在形成中，其出发点应该不是要搞坏中美关系，而是要从中最大限度地谋取利益。但是如果对方胃口太大，或处理双边关系的方式不当，中方就必须坚决回击，过去的经验表明，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能够推动对方的政策调整。在与美国新政府的关系步入轨道之后，还要注意在互动中不断引导对方。特朗普要“使美国再次伟大”，离不开和中国的经济合作，经济上的“互利共赢”是特朗普时期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此基础上形成务实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可以期待的。²² 在此过程中，我们要积极提高中美关系的品质，使双边关系的发展更好地体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¹ 笔者数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https://www.bea.gov>。

² 莫业林，“荣鼎咨询：中国对美直投 2015 年首超美对华投资，”财新网：<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6-11-16/101008146.html>，登录时间：2017 年 1 月 18 日；章念生，“投资合作促进中美双赢，”《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4 日，第 3 版。

³ 国防支出数据参考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数据库，2015 年，中国的国防支出为 2150 亿美元，美国的国防支出为 5960 亿美元，单位为现价美元，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访问日期: 2016 年 9 月 18 日。

⁴ 胡波, “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军事竞争与战略平衡”,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5 期, 第 64-84 页; David C. Gompert, Astrid Stuth Cevallos, Cristina L. Garafola, *War with China: Think Through the Unthinkable*, RAND Corporation, 2016.

⁵ 吴心伯, “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3 期, 第 143-149 页。

⁶ 吴心伯, “新常态下中美关系发展的特征与趋势”, 《国际问题研究》2016 年第 2 期, 第 14-28 页。

⁷ “习近平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的致辞”, 外交部网站, 2015 年 9 月 26 日,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5nzt/xpjdmgjxgsfw_684149/zxxx_684151/t1300765.shtml, 登录时间: 2017 年 2 月 14 日。

⁸ 参见: 特朗普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演讲, 2016 年 7 月 21 日, <http://www.nbcnewyork.com/news/politics/Transcript-Donald-Trump-Accepts-Republican-Nomination-For-President-387846862.html>; 特朗普就职演讲, 2017 年 1 月 20 日, <https://www.whitehouse.gov/inaugural-address>, 登录时间, 2017 年 2 月 15 日。

⁹ 2016 年共和党党纲, [https://prod-cdn-static.gop.com/media/documents/DRAFT_12_FINAL\[1\]-ben_1468872234.pdf](https://prod-cdn-static.gop.com/media/documents/DRAFT_12_FINAL[1]-ben_1468872234.pdf), 登录时间, 2017 年 2 月 15 日。

¹⁰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外交部网站, 2017 年 2 月 10 日, <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37404.shtml>, 登录时间: 2017 年 2 月 13 日。

¹¹ 张旺、陈欣, “美对南海发难让世界担忧”, 《环球时报》2017 年 1 月 25 日, 第 3 版。

¹² “美防长访日淡化南海强硬立场, 称用外交解决争端”, 参考消息网 2017 年 2 月 6 日, <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70206/1661741.shtml>, 登录时间: 2017 年 2 月 11 日。

¹³ 例如, 特朗普一上台, 美国军方就推动加大美军在南海的巡航力度。—郭媛丹、陈欣, “美军酝酿加大南海巡航力度”, 《环球时报》2017 年 2 月 14 日, 第 3 版。

¹⁴ 2016 年, 朝鲜两次进行核试验, 2017 年 2 月 12 日, 朝鲜成功发射一枚地对地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

¹⁵ 吴心伯、达巍主编, 《美国向何处去? 从 2016 年大选看美国的走向》(复旦大学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协同创新中心, 2016 年 11 月), 第 68 页。

¹⁶ 有中国学者指出, “特朗普的外交理念更具实用主义而非基于对美国民主、人权等制度的和价值观的推广, 其任内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可能会减少”。王栋、孙

冰岩，“特朗普对华外交会如何出招？全方位解读，”《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2期，第19页。

¹⁷ 王栋、孙冰岩，“特朗普对华外交会如何出招？全方位解读”，第17-21页；达巍，“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前瞻：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美国研究》2016年第6期，第19页。

¹⁸ 崔立如，“准备应对中美关系面临的新挑战，”《环球时报》2017年2月3日，第14版。

¹⁹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eadout of the President’s Call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China”, February 9,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02/09/readout-presidents-call-president-xi-jinping-china>, 登录时间, 2017年2月14日。

²⁰ “王毅外长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外交部网站，2017年2月17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39485.shtml>, 登录时间, 2017年2月20日。

²¹ “Readout from a Treasury Spokesperson of Secretary Mnuchin’s Call with Chinese Counterparts”, 美国财政部网站，2017年2月17日，<https://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Pages/sm0008.aspx>, 登录时间, 2017年2月20日。

²² 例如，2016年11月14日，习近平在同当选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中美需要合作和可以合作的事情很多”，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习近平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外交部网站，2016年11月14日，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t1415197.shtm, 登录时间, 2017年2月16日；2017年2月10日，习近平在同特朗普总统通话时表示，“中美两国发展完全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双方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特朗普表示，“美中作为合作伙伴，可以通过共同努力，推动我们双边关系达到历史新高。美方致力于加强两国在经贸、投资等领域和国际事务中的互利合作。”—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